

# 无人区里唱大歌

——评刘国强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 □李春雷

刘国强的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讲述了一个神秘领域里发生的感人故事。在辽阔的新疆罗布泊千里无人区，一伙年轻人艰苦创业，拼搏多年，在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生命的地球“旱极”、“死亡之海”，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钾肥的魔咒，历经磨难终于开发、生产出优质钾肥，终结了中国依靠进口高价钾肥的历史，使中国农业挺起了脊梁，让中国农民用上最便宜的钾肥，为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立了大功。

作家刘国强对这个英雄的群体满怀崇敬，饱含深情，塑造了全国时代楷模李守江和他的团队的英雄群像。作品中令人惊悚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他们既吃苦耐劳住地窝子、在“生命禁区”超越身体承受极限坚持拼搏创业，在恶劣的环境下实现了科技创新，曾经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一举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硫酸钾航母。又在钾肥进出口谈判桌上，中国人由毫无话语权到成为左右世界钾肥局势、一言九鼎的主人。

刘国强饱含深情地生动描述了大戈壁滩创业者们的英雄壮举。干旱的罗布泊炎热如火，地表温度达七八十度，鞋子脱下放地上几分钟就晒“歪腿”穿不上了。打个生鸡蛋放铁锹上会“咕啦啦”烫熟。工人们数月吃不上蔬菜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每一滴水都要穿越400多公里的大戈壁才能运来，水紧张时只好不洗衣服、不洗脸、不刷牙。三八妇女节，工厂头一次大方地给那些年轻的“80后”、“90后”姑娘们发放奖品，居然是洗一次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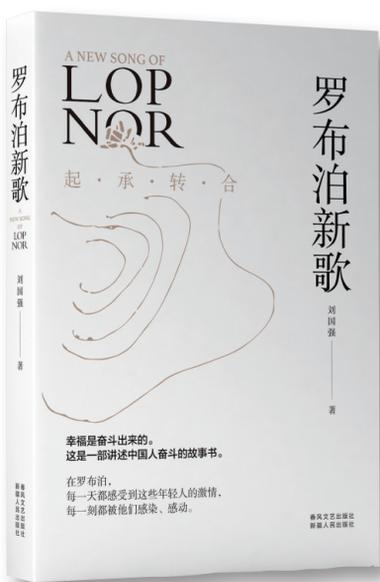
一位连续9个月坚持战斗在无人区的姑娘，回到哈密看到久违的绿色万般惊喜，她下车后的第一件事竟是紧紧抱住树干大哭一场……

寒冷的冬季，寒风吹透帐篷，夜间工人们冻得个个“当团长”，实在抵抗不住，烧一堆火取暖，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罗布泊的气候瞬息万变，有时一天会经历风雨雷雪沙尘暴。

沙尘暴突然狂猛来袭，揭天掀地，刹那间白昼如黑夜，对面不见人。沙暴过后，避难的汽车迎风一面的漆被打落，成了“白铁片子”。修路的帐篷被风撕毁，工区夷为平地，锅碗瓢盆刮出去十几里地。

《罗布泊新歌》在表现家国情怀，表现创业者的奋斗精神，表现科技探索方面都有精彩的表达方式，尤其在表现罗布泊特殊恶劣环境下创造的奇迹方面，生动而传奇，有极强的“带入感”。新中国成立后，罗布泊诞生了“两部大歌”，一是制造了核武器，让中国挺起了脊梁；二是生产了钾肥，让中国农业挺直了脊梁。



作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辽阔。最可贵的是，刘国强在作品的文本规划和创作上显现了不错的创新能力、驾驭能力和才华。

纵观中国当代报告文学，针对普遍存在“只有报告，没有文学”的现状，刘国强在《罗布泊新歌》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以雄浑震撼的交响乐的方式，唱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时代大歌。

从整体构建上，以“新歌”设定“大主旋”，全篇的大规划为“四个乐章”，用“起、承、转、合”构建，第一乐章为“起”，第二乐章为“承”，第三乐章为“转”，第四乐章为“合”。主旋大海下分别设定“第二交响”共计十二歌，以第一歌至第十二歌纵向整体贯穿，每一歌都用一首原创歌词开头，都有“微调”的节奏承上启下，从而实现既有整体的大开大合，一泻千里磅礴恢弘的气势，又有局部的细流微波、呢喃小调。通篇以“前奏”启幕，以“尾声”收官，将所有“乐器”的演奏、齐奏、合奏、轮奏都纳入壮阔雄强的“大旋”中，解决了大而中空、强而有柔的矛盾冲突。

结构是形式，结构也是内容。这种根据内容而设定结构的方式令人称道。因为，它实现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升华。

文贵出新。作品初读令人“眼前一亮”，却又后劲十足，放敛有序，体现了作家对复杂文本局面的开拓创新能力和有效掌控能力。

刘国强跳出当今多数报告文学作品就故事而讲故事、就事件而罗列事件的圈子，而是将这些先天在成分很好、品相和功能欠佳的素材，变成“有科技含量”的新产品。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掘人性，捕捉人物特点，排除了众多作品叙述淹没人物、故事淹没人物、专业淹没人物等障碍，塑造了立体丰满的“圆雕式”的立体人物，避免了人物的扁平化。

从《罗布泊新歌》中，我们感受到“新文体融合”的氛围。作家汲取了小说的叙述，诗歌的简洁，散文的唯美，影视文学的立体形象，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等元素，将它们以内在的逻辑和思想有机融合，实现了立体表达，根据需要或浓墨重彩突出主体，或删繁就简艺术剪裁，加大张力，增强辐射，提升报告文学的文体质量。

作者同时对语言文字怀有深深的敬畏，他强调语言的张力和思想性。他在作品中剔除资料堆砌，剔除公共话语，剔除冗长的叙述，剔除“跟着故事跑”的迷茫讲述，甚至剔除成语一类的“现成词汇”，而是探索有着独特艺术标识的个性化语言。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建筑，那么，语言就是最小的建筑单位。语言粗制滥造、质地不行，建筑作品怎么会好？

写罗布泊的文章太多了，刘国强作品的开头别开生面：“塔克拉玛干高高挺起辽阔的胸膛，拧劲儿秀着成排成排的大肌肉块儿。这个号称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的大沙漠，每个大肌肉块儿都是烈烈燃烧的大火把，仿佛要烤干整个世界，它的近邻遭了殃——罗布泊大锅里水添满了，烧干，再添满再烧干，第5次（罗布泊干涸的5个阶段）被烧干锅，再也无水可添，罗布泊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之海’、无人区、地球上的‘旱极’，只剩下一片厚厚的‘锅底灰’……”岁月用缺牙的老齿，啃坏了罗布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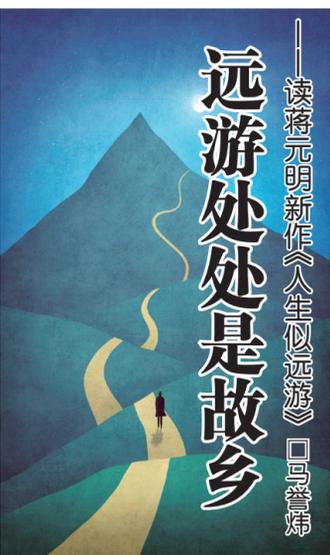
难怪诸多评论家说《罗布泊新歌》作品“语言唯美，很有特色”，“这个时代到处都是歌唱，但刘国强的作品里存在真的诗意”。《罗布泊新歌》的语言运用和叙事结构讲究，作者对汉语心怀敬畏，对自己写下的文字十分尊重，用音乐结构融合人物事迹，字里行间洋溢着饱满的诗意。语言也是载体，不光承载内容，更要承载思想。故事讲完了，余音还在；人物离开了，思考还在；事情做完了，经验还在；文章读完了，思想还在——刘国强的这些追求，在《罗布泊新歌》中都有出色呈现。

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宅家的日子里，我收到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副主任、现任北京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蒋元明先生寄来的随笔散文精选《人生似远游》（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读之有足不出户、畅游天下的感觉，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蒋元明先生的了解和敬佩。

蒋元明，重庆人，与共和国同龄。他20岁从军到青海，后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人民日报》先后任文艺副刊编辑、副刊主编、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我在与他未曾谋面时就知晓他的大名，曾在国内许多大报大刊上零零散散读过他不少的杂文和随笔作品。相识后，我们先后一起去福建莆田和安徽芜湖采风，经常在一起参加首都杂文界作家的活动。文如其人。在他身上，既有军人的耿直、执着、仗义，又有文人的儒雅、睿智、风趣，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可交之人。

谈罢《人生似远游》，掩卷沉思，蒋元明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倘若用一条主线串起来，这就是：爱。

从骨子里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两岁就没有了娘，十几岁即外出打工，挑过烂泥巴，卖过臭苦力，经历过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求解放，他家才过上了新生活。因此，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新社会好，共产党亲，立志长大成人，报效祖国。从军以后，在领略祖国疆土之辽阔博大的同时，也体验到了解放军官兵卫国戍边的艰辛，受到了系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南开大学深造后，又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长期办文学副刊，致力文学发展和培育文学新人。退休后，他没有选择在家里享清福，而是迈开双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写了大量的游记，许多都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用。正是由于有了从心底里对祖国的挚爱，才使得他



看山山美，看水水靓，努力挖掘出山水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读者提供更多精神食粮。

对父母、亲人充满孝心和爱心。在蒋元明的笔下，母亲是那样的善良、勤劳。在农村，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用背篓背大儿孙两代人。困难时期，过年巧手制作颇具地方特色的“灰水汤圆”，好年景则以核桃仁、黑芝麻、花生米捣碎，加拌红糖与热猪油混合而成香香的“汤圆馅”。父亲吃苦、耐劳、朴实，奔波在重庆城、北碚、澄江等地工作，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退休后，父亲常坐茶馆“摆龙门阵”。为了让辛苦一生的老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父母80岁之后，蒋元明在家庭里启动“十年养老工程”，全家总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这一切都做得特别自觉、自然。他认为，照顾自己的父母，不仅是知恩图报，做儿女天经地义的义务，而且也是

一种能够在家族中传承的道德品质和长寿基因，是会荫及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在蒋元明和其弟弟妹妹的精心护理下，父亲活到94岁，母亲活到91岁。孝心可鉴，爱心无价。

老天像是故意在考验蒋元明。他的独生子蒋萌，在不到10岁、上小学五年级时，被诊断患有脊髓肿瘤重症，这种病贯穿颈椎到腰椎，造成脊柱侧弯、脖子和手臂疼痛难忍，最后导致全身瘫痪，以至危及生命。为了治疗儿子



的病，蒋元明跑遍了京城的各大医院，后又远赴上海，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换回儿子常年在轮椅上生活的一条生命。儿子因病不能复学，蒋元明没有放弃培养其成才的努力。他发现儿子身上有一点长进，就及时予以鼓励；了解儿子有某种学习兴趣，就千方百计给予支持，尽心把他引上写作道路。他还和夫人一起自驾游，陪儿子坐着轮椅到全国各地旅游观光。在父母的呵护下，蒋萌自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英语课程，掌握了计算机知识，爱上了网评

和文学写作，担任几个国家级网站的“特约网评员”，被东方网评为“优秀网评员”，人民网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网评人”。后被正式录用为人民网的编辑、评论员，独立主持网络栏目。出版了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先后加入了北京市杂文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去年，又被团中央授予“爱岗敬业”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称号，《人民日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他自强不息、刻苦成才的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蒋元明的博大爱心，使一个身有残疾的儿子，成为自己今生“最好的作品”，为爱创造奇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蒋元明十分珍爱自己当兵的历史，他在《永不消逝的军号声》一文中说：“我忘不了青海，忘不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军号声，不管见到哪一个穿军装的人，就想上去说一声：我也当过兵……”为什么他对军队有如此的爱，只因为他觉得“军人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军人是一群热血男儿！”蒋元明对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报社工作岗位情有独钟。他在《秀才人情纸一张》一文中，通过叙述与老报人范敬宜交往的历史，流露出自己对办副刊30多年的留恋与珍惜，文以载道，以文辅仁，以文会友的情感跃然纸上。

远游处处是故乡。蒋元明自青年时期离开故土重庆，一直在外闯荡，从青海到天津、北京，退休后又像一只辛勤的蜜蜂，走遍神州，将自己的性情和寄托不断倾泻于纸上，在边塞、都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间，采撷最美的风景和花露，寻找心灵的归宿与生命的启迪。这无疑既是朴实朴素、辛劳不懈，又瑰丽绚烂、充满爱意的人生。

但愿他的这种大爱，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承、发扬光大。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英文原版出版于2018年的《1918年之疫》,如其书名副题“Eyewitness Accounts—from the Greatest Medical Holocaust in Modern History”所示,是一本试图用目击者亲历亲闻的记述,对人类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疫灾,进行情景再现和历史追溯的书。3月份,它的中译本问世,恰逢新冠病毒在全球大规模扩散的态势加剧。特殊的现实氛围,使人们比寻常时候更多地关切起了有关生命健康和防控流行病的信息与知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回望过去,以史为鉴的种种探寻。

百余年前的那场被以讹传讹地俗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疫灾,猝然爆发于1918年初,先后经过三次起伏,持续两年之久,蔓延至世界各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直至1920年初才彻底消退。作为人类现代史上空前凄惨的一页,这次疫灾的大体过程和关键细节,早有很多流传甚广并且已经数字化为网络资源的文献和照片,予以记载和呈现。但全面系统的描述、阐释和省思,还是深藏在专题性的著作当中。在这本今年新出炉的《1918年之疫》之前,2008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出过一本类似内容的英译汉科普读物《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多人合译)。

不过,这两本书在取材和写法上各有千秋。同样都是顺着疫情变化的时序展开叙述,《大流感》的视角基本限定在美国国内,视点主要落在医疗、防疫举措和政府决策层面,行文话语富有专业色彩,数据和史实的交代力求精确条理。全书“终场”部分的一段附记和一番忠告,可谓苦口婆心的金玉良言。一位经历了艰苦抗疫,在疫情结束后荣享了盛名的病毒学家,却因耽迷于过多的社交,很快散了心神,荒废了本业,辜负了同行厚望和自我期许,最终也没能取得任何研究突破。而对于“当权者”,作者提请他们务必珍惜公众对自己的信任,无论真相多么恐怖,都应将其公之于众,因为只有不隐瞒真相,才能真正打破社会恐慌。

相比之下,《1918年之疫》整体上的措辞风格和素材处理都显得更加亲民,视野也更加开阔。它的观照范围远远超出了一国一地的疆界,覆盖了欧美澳非亚各洲的众多国家。由此,它给读者拼接成的图景,也更能凸显那场大疫灾席卷全球、无远弗届的惨烈程度。疫灾之巨,莫过于它是在同时同等地威胁和伤害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在针对特定的哪个地方、哪个国家或哪个种族。根据《大流感》和《1918年之疫》中透露的新近研究结论,全世界死于百余年前这场疫灾的人数,远高于以往的估计,并且也数倍于以至10倍于疫灾期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伤亡人数,高达5千万至1亿的量级。因而,今天即使只是通过阅读文字,来凝视现代人类生存进程中这一至暗时刻,也仍然会使人感到心情沉重。

《1918年之疫》的作者,显然深谙这种阅读心理。她在书前导论中自陈,这本书的目的是“从目击者的视角考察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冲击,这些人或颇有名气,或籍籍无名。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呈现伦敦东区女生、梅菲尔区富家千金、波士顿学生和意大利移民们的回忆。”而全书结尾的一句话,则是作者对她的受访者之一、参加揭秘“西班牙流感病毒”探险研究的皇家伦敦医学院奥克斯福德教授的谈话中,特意摘选来的:抗击流感之疫是由“无数男男女女日常中的英勇行为构成的,在1918年,相比于西线(指一战前线),大本营里涌现出了更多的英勇事迹”。

通读全书,可以明显感到,作者的写作承诺确已不折不扣地兑现。《大流感》里以大叙事的客观冷峻笔调,着力深究细述的官僚腐败、医疗苦战、防控艰巨等内容,在《1918年之疫》中同样也有,但换成了基于个体视角和主观体验的生动可感的小叙事陈述。而《大流感》里着墨不多的患者的痛苦、医护现场的悲怆、危机时刻人性光芒的迸发,《1918年之疫》却给了篇幅比重最大的细致展示。更可贵的,这些展示完全采用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式的冷静交加的手法:作者尽可能闲静,让素材和当事人自己直接说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18年之疫》显露出了它自觉立足于呈现“凡人遭难”而不只是“社会受伤”的写作伦理立场。

也正因为,尽管先哲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然在前,《1918年之疫》还是向今天的读者释放出了极强的代入感。百余年前那场大疫灾的创痛,至今还驻留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中,血泪斑斑,惨烈如初。它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反衬着常态岁月里的明媚阳光,也像一块巨大的顽石,警示着人们千万留神,别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

《勘破狐狸窗》,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出版



书如其名,《勘破狐狸窗》是一本钩沉索隐、探幽发微的小书。而它打捞出掘的对象,则是“狐狸窗”这个日本民间流传下来的除魅显形、透视真相的手势,所能关联的各种见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细节的档案、书籍、日记等文本,以及人与事。

书分“人事”“书事”上下两辑,各收独立拟题、略具呼应的学术随笔六七篇。《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教波先生》,可能是最醒目的一篇,早两年在《读书》杂志刊登时,就曾引起长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湮没在鲁迅散文名篇《藤野先生》字面背后的教波重次郎(1872-1965),比藤野先生年长两岁,比鲁迅年长9岁,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求学时的老师,也是曾与藤野先生一道在东京帝国大学解剖学部进修的同学,还和藤野先生搭伴,担任过鲁迅当时所在年级的正、副班长(班主任)。而教波跟《藤野先生》联系最紧密之处,则是文中提到的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课,实际上是和教波合作任教的,只不过教波把给学生评分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藤野。而现存的仙台医学专教学档案表明,周树人的成绩单里分数最低的那门课正是由藤野先生打分的解剖学,因最后一个学期得了58分,三个学期的总平均分只有59.3(丁),结果没能及格。

照当今校园生活中师生关系的常情常理,鲁迅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格外尊重和感念藤野先生,同时,更没有特别的理由,把教波先生从他专门回忆仙台求学经历的散文里完全抹去。毕竟教波先生没有在成绩评定上给鲁迅施加过压力。更何况,在藤野先生批改过的鲁迅那些解剖学课堂笔记里,还同样留着教波先生的批阅笔迹,只是不如藤野先生批注得那么细致那么多罢了。对这些疑问,作者进行的勘察和侦破,堪称精到。原来,教波当时在仙台医专,属于和藤野在形象、声望、职位、学历背景和专业能力各方面,都明显占优的更高一个层次。他享有的工作待遇和校方重用,以及老师和学生们的拥戴,都是清贫刻板的藤野先生所不能企及的。对于教波这样一位春风得意的老师,青年周树人当时没法产生多少亲近感,过后有意无意地迅速遗忘,甚至从记忆中和笔端下终于完全抹去,也算不得不合情理。

书中其他各篇,如《“甘党”夏目漱石与周作人的羊羹》《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在东京的边境,偶遇(边境)》《朱自清备课用书的东流经历》《那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等,也都爬梳细密,多有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的材料披露和观点申论,颇值得一读。